

文化書評

楊天宏著:《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486頁。

Yang Tian Hung. *CHRISTIANITY AND MODERN CHINA: A Study of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Chengtu: Sichwan Renmin Chubanshe, 1994. 486pp.

隨著中國大陸學術界從意識形態的束縛中逐步解放出來,學者在中國教會史的範圍內,也漸漸脫離過往的帝國主義侵華史觀,以更客觀及嚴謹的態度進行學術研究。在處理若干較為敏感的課題,如傳教士的評價問題,及中國人反對基督教的原因時,他們亦不再困囿在傳統的解說模式之內,反倒呈現多元化的學術討論。楊天宏的《基督教與近代中國》,便是其中不可忽略的例子。

楊天宏現為四川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及中國近代史教研室主任,近年全力進行有關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的考察,本書是他的研究成果。奇怪的是,他以《基督教與近代中國》作為著作的名稱,難免令人誤以為這是一本討論中國近代教會史的通史,反觀其英文書名的副題: *A Study of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更能切合全書的題旨。

正如作者在序言裡指出,他對老一輩的學者滿懷革命熱情來從事歷史研究的做法,極表不滿。他們在處理教會史上民教衝突的課題時,往往從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角度,作出是非褒貶。作者質疑在學術研究的領域,是否仍

有必要表現出這些政治傾向。職是之故，他為自己確立了三方面的聯繫與區別，作為全面研究與價評的基點：第一，是基督教與基督教會的聯繫與區別；第二是近代基督教與中世紀基督教的聯繫與區別；第三是基督教與外國資本主義列強的聯繫與區別（序言頁4至5）。也是在這個基礎之上，作者展開對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間非基運動的考察與評價。

作者不僅突破了學術研究的泛政治傾向，也一改大陸學術界向來不重視二手資料的習慣。綜觀全書，他對中外學者在非基運動方面的研究成果，例如魯珍晞（Jessie G. Lutz）、葉嘉熾（Yip Ka-che）、葉仁昌、查時傑、山本條太郎與山本澄子（Tatsuro & Sumiko Yamamoto）等著作，均詳加參考，或援引其論據，或提出其商榷的意見。這種注重他人研究成果與「學術累積」傳統的做法，在海外學術界已廣泛被接納為做研究的先決條件，但在國內仍處於起步的階段。楊著的出現，不失為一可喜的現象。當然，中外學者既對非基運動已有相當豐碩的研究，則作者在立論方面如何作出突破，進而成一家之言，便成為衡量本書價值的重要標準。

除序言外，全書共六章，分別探討非基運動的背景（第一、二章）、歷程（第三至五章）、影響及本質（第六章）等問題。作者建基於大量原始資料，並汲取了不少重要的二手研究後，認為非基運動是「一次真正理性的宗教批判運動」（頁428）。這個運動兼備兩重的性質，一方面，這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啟蒙運動」，在承繼新文化運動方面，與西方啟蒙運動有著密切的關連（頁446）；另一方面，又帶著強烈的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民族主義成為真正左右非基人士的言行，並決定反教運動的本質與發展方向的原動力（頁430）。

為了確立非基運動的思想啟蒙意義，作者在「新文化運動與非基督教運動的醞釀」一章中，通過國人從「反孔」到「非耶」的轉變，詳細縷述新文化運動與非基運動間的關係。他指出雖然新文化運動的矛頭乃直接針對傳統中國文化（「反孔」），但與此同時，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科學、民主）的擁抱，又必然地「啟迪先進的中國人對基督教『神』文化作一番較深層次的思考認識」，非基運動遂成為「新文化運動發展的必然邏輯」（頁49）。這裡，作者顯然從（西方）「啟蒙運動」的角度來解讀非基運動，指出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家，除了由於潛在的民族主義意識的驅使外，無論從人文主義的傳統、以至價值觀及思想模式方面，均與西方的啟蒙運動同出一轍；因而必然地將反對的對象，從傳統文化擴展至對基督教文化（代表迷信與非理性的神權）的批判（頁60-65）。

另一方面，作者又詳細交代了民國以還基督教傳教事業的發展，特別是教會因著「中華歸主」（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的目標與行動而帶來的勢力擴展，對處於民族主義高漲下的國人的刺激。「從根本上講，非基督教運動乃是對民元以來教會事業發展的一種反抗。」（頁115）如此，便確立了作者對非基運動性質的理解，正如他再三強調，「就其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而言，非基督教運動以科學反對神學、以人權推倒神權，具有鮮明的民主革命的性質；就其是一場政治運動而言，非基督教運動高揚民族主義旗幟，激勵民族自覺意識和獨立精神，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各種形式的對華侵略，又具有突出的民族革命的特性。（頁446）」

作者將非基運動定性為一場思想啟蒙運動，並強調其與西方啟蒙運動在抗拒神權方面的同質性，顯然是本書立論獨特之處。不過，筆者對此卻有數點意見。第一，這裡涉及關於非基運動的上限問題，作者認為，從新文化運動的範圍內對基督教從事研究與批判的思想運動，其實早在五四前便已揭幕（頁48），因而主張以1915至1922年為運動的第一階段。但是，雖然中國知識分子在新文化運動期間，確實在批判傳統文化的同時，也引進了西方的無神論思想；並且此等新思潮在若干程度上對基督教信仰，特別是其中超自然或無法通過科學、理性標準的教義，帶來極大的挑戰與衝擊。但是，此階段關於宗教問題的討論，事實上仍在相當理性的氣氛下進行（作者在頁92也提及此點），抑且所針對的問題，大多僅涉及基督教的教義部分。這與1922年後的反教運動全面指控基督教與帝國主義間的關係的做法，在本質上大為迥異；前者屬思想啟蒙層面的討論，後者為政治革命運動的控訴，不宜混為一談。故此，視1922年以前的宗教討論時期為非基運動的第一階段，其實並不恰當。

第二，即使在思想啟蒙的範圍內，作者也忽視了在1916至1922年間，基督教作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其實是頗受中國知識分子的歡迎的，並且被視為救國的其中一個考慮。這是基督教人格救國論在二十世紀初期盛行的原因。〔拙著：〈二十世紀初年的「基督教救國論」（1900-1922）——中國教會回應時代處境一例〉，《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十一期（1991年7月）〕因此，要解讀新文化運動時期知識分子與基督教的關係，必須置於中國社會在啟蒙與救亡的相互促進的脈絡之下，而不應單純將西方啟蒙運動的經驗直接讀進中國的處境，因而過分強調兩者的同質性與必然關聯性。

第三，1919年五四運動的發生，毋寧是知識分子思想政治化及激進化的重要轉折，他們對中國問題的思考，也從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思想文化革命，轉向投身政治革命運動。在「救亡」壓倒「啟蒙」的情況下，反帝國主義因而成為二十年代的思潮中心。也是在這個處境下，非基督教運動才得以在1922年因著「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在北京召開大會而併發出來，並在1924年國共合作的「反帝」大氣候中，進入另一個階段。職是之故，筆者以為，以反帝國主義為方向的民族主義運動，方為解讀非基運動的主要進路，作者以思想啟蒙與民族主義作為非基運動的雙重本質，無疑忽略了兩者在內在理念上的矛盾，及在具體歷史處境上的歧異性。事實上，作者在分疏非基人士的言行時，也曾認為真正發揮主導作用的思想，既非科學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理論，反倒是民族主義（頁429-32）。要是民族主義確實為非基人士的共同意識，則作者在書中多次強調非基運動的思想啟蒙性質，便顯得有點自相矛盾了。

若單就民族主義的角度而言，作者在陳述非基運動從1922年到1927年間的發展時，確實對運動在不同階段的特色與變化，予以持平及客觀的分析。特別是關於國共兩黨在非基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上，均有深入的解說（參第三至五章）。事實上，學者對政黨在非基運動的參與程度，向來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作者依據充分的史料，說明國共兩黨在不同階段所產生的不同作用，實在是全書的價值所在，為讀者釐清了不少爭議的問題。此外，作者也將非基運動在不同階段不同地區的發展，及教會知識分子的回應整理出來，從中更可見「反帝」及民族主義確實為運動的指導核心，成為反教與護教者的對話焦點，也證實1922年後的非基運動，壓根兒是一場反帝運動。第三章至第五章的龐大篇幅，無疑為全書的精華所在，亦顯示作者的史學造詣。

不過，在處理個別問題方面，筆者仍有數點意見，欲向作者請教。第一，作者認為不少海外學者對北伐過程中發生的暴力反教事件，「或多或少誇大了北伐對教會事業的衝擊」（頁389）。他更以「反教活動開展得較為激烈的武漢地區為例」，意圖說明武漢雖然確實發生了北伐軍衝擊教會機構、毀損教產的事件，宗教活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擾，但實際上並沒有發生過「嚴重的暴力事件」。至於安徽、福建、江西、浙江諸省，「即使是佔駐教堂、挪用教產這類事件，也大多是有秩序的進行，盲目的一哄而起的打教事件鮮有所聞。」（頁389-90）真正要為那些偶發的反教暴力事件負責的，不是北伐軍，而是一些「地痞流氓」而已（頁392）。筆者在此無意否定作者對教會在上述地區（特別是武漢）受到衝擊的評析，並且十分認同武漢地區的反教暴力事件，其實並不嚴重的說法。但問

題是，作者說武漢是「反教活動開展得較為激烈」的地區，便很值得商榷了。北伐期間教會受到最大衝擊的地區，恰恰是作者忽略了兩湖地區。在作者援引的《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十期中，便有一篇題為〈暴風疾雨以後的湖南教會〉的文章，詳細報道了湖南教會受到群眾運動搗亂的情況。其實，由於共黨在兩湖地區的勢力較大，群眾運動對各界（不僅是教會）的衝擊也較其他地區為嚴重。因此，筆者以為，與其完全將責任歸咎於「地痞流氓」，倒不如從失控群眾運動的角度來理解有關的暴力事件，更為恰當。並且，正因為兩湖地區的教訓，才促使武漢國民政府內的國民黨左派對此等失控的群眾運動有所警惕，並通過限制民眾運動及保障外人所辦學校、教堂的議案。〔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下冊，頁1072-73、1097-98〕加上武漢地區教會在1926年底成立的「武漢基督徒革命聯合會」，發表宣言強調基督徒對國民革命及三民主義之支持與信仰，在若干程度上，亦緩和了當地革命浪潮對教會的衝擊。

第二，作者指出非基運動既促成了中國信徒的覺悟，又「造成了中國教會不能不自立的形勢」（頁437-38）。特別是北伐期間的反教風潮促使大量傳教士紛紛撤離中國，「在客觀上有利於改變中國教會由外國差會控制的現狀，向著自傳、自養、自立的道路發展。」（頁393）「推動基督教在華傳教事業的責任，也就無可旁貸地落到了廣大中國教徒肩上」（頁438）。無疑，傳教士的撤離，確實在「客觀」形勢有利於促成中國教會的自立，但是，作者顯然忽視了中國教會究竟能否真箇具備自立的「客觀」條件。正如有學者指出，雖然在1925年後，因著非基運動的衝擊，不少傳教士自願或非自願地交出教會的治權，但是由於失去了差會的支持，中國教會卻因此而面對嚴重的資金短缺問題。〔徐小群：〈傳教士與中國民族主義運動（1922-1928）〉，王晴佳、陳兼編：《中西歷史論辯集——留美歷史學者學術文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頁85-88〕職是之故，筆者以為，在龐大傳教事業的經濟支出及中國教會在經費上不能不仰賴西方差會的大前提下，我們不能誇大非基運動在促成教會在自傳、自養及自立方面的實際成效。

第三，這涉及非基運動的下限問題。作者指出，隨著北伐的結束，及國民黨的清黨，在在促使國民黨的反教人士不能再以群眾運動的方式來從事反教活動。雖然，1928年後在國民黨內仍有激進的反教人士堅持其反教立場，並就信教自由的問題而展開一場爭論；但是，「無論就規模還是就進行方式而言，這次討論都算不上一『運動』，充其量是此前反教運動的『餘波迴蕩』……」（頁420）

因此，非基督教運動也隨著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而落下帷幕（頁422）。不過，筆者以為，作者既忽視了上述關於信教自由論爭的意義，也低估了1928年以後所謂反教「餘波」所產生的衝擊。就後者而言，當時反教的情緒，在報章上仍然隨處可見。例如，國民黨的機關報《民國日報》在1928年12月的聖誕日，仍以一整版的篇幅，出版了「非基特刊」。在1929年1月1日，更隨報印發厚達一百多頁的《不平等條約研究集》，當中的文化侵略部分，即詳細地以大量文字，配合多個圖表，說明基督教如何在中國進行文化侵略。這種針對基督教的情況，一直持續至1932年《民國日報》停刊為止。可見，反基督教的言論並沒有在1928年以後便結束，反倒在一些國民黨黨員的指導下，開展了另一種形式的反教。基督教因而面對來自三民主義的挑戰，這些雖說不上是一場「運動」，但也不能僅視之為「餘波迴蕩」。〔拙著：〈上海《民國日報》中的基督教會史料〉，《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十八期（1994年9月），頁135-36〕

作者雖然專注於二十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但也常將之對照晚清時期的教案，從而突顯中國人在兩個世紀上反對基督教的不同特色。例如作者認為兩者無論從組織領導及群眾參與、反教的目的及手段方面，皆存在極大的差距（頁424-27）。此外，在第一章中，作者又指出晚清教案發生的原因，不僅出於中國人民反抗列強侵略的民族矛盾，也源於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間的差異（頁20）。除了部分西方傳教士的自大行為外，作者更強調儒家傳統在教案中所產生的作用。「儒學文化傳統在國人心中先入為主，佔據了支配地位」，「要維護儒學正統地位就必須抵制基督教文化對中國社會的滲透」（頁27）。此外，他又指出在晚清階段，中國人反教大多流於非理性的批判，這又與民國二十年代以還非基運動的理性批判迥異（頁47）。其中的原因，主要與二十世紀後新文化運動的時代背景緊密相連。無疑，作者指陳反教運動從非理性到理性批判的發展歷程，確實是有所陳述的。然而，他對晚清教案爆發原因的理解，卻又嫌失諸籠統；雖已突破清一色的反洋教鬥爭舊調，卻又不能擺脫中國傳統反教論的陰影。持平而言，關於晚清教案的肇因，單純強調「反洋教」或「傳統反教」的一元進路，或者兼採兩者的二元模式，其實都不能對數以千計的民教衝突有全面的理解。更多從不同時（整體中外關係的氣候）、空（區域的社會經濟背景）的脈絡之下，考慮中國官紳、民眾與傳教士、教民間在現實利益與傳統倫理風俗間的互動關係，方為檢視晚清教案的合理進路。不過，作者既以二十年代的非基運動為討論核心，在晚清方面的背景也就不能過於苛求了。

總的來說，本書廣泛徵引不同史料，亦能兼顧到中學者的研究成果，實不失為中國大陸迄今研究非基運動方面最完備的專著，也成為日後研究此課題者不可忽視的著作之一。在此期待作者在中國教會史的領域裡，能發表更多的研究成果，為這個研究園地，增添更多奇葩。

邢福增
建道神學院